



我在中央党校的另类学习

□ 赵腊平

2015年9月至12月，我有幸参加了中央党校厅局级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专题研究班的学习，为期3个月。时间不长，但所获丰厚。近8年了，记忆犹新。

中央党校是我们党培训和轮训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也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精神气质高雅的神圣殿堂。中央党校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江西的中央苏区，90年历经风雨沧桑，一路走来，红色基因纯净。特别是老校长毛泽东为中央党校确立“实事求是”的校训，铭刻在一代又一代党校学员的脑海中并生根发芽，焕发出无穷的生机与活力。

中央党校大力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同时，大力优化校园环境，形成了具有党校特色的浓郁文化氛围。在紧张的学习之暇，我常常漫步在环境清幽、风光旖旎的校园里，一边游览那些具有江南园林特色的优美景致和典雅古朴的亭台楼阁，一边欣赏那些得到精心呵护的参天古树，或者应季次第绽开的各色花卉，或湖光山色、竹林小径、石上溪流……从中领悟到中央党校校园文化的内涵，收获陶冶性情、寓教于乐的功效。

楹联文化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堪称中央党校校园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枝别具特色的奇葩。在校园内，环掠燕湖及至周边，散布着鉴水平云、罔极阁、敷山亭、敞轩、秋观楼、听雨轩、留筠馆、正蒙斋等错落有致的仿古建筑，这些建筑的门柱、檐柱、抱柱、门屏上等汇集了楹联、匾额等诸多的传统文化艺术形式，而当中的楹联非常引人注目。

众所周知，对联是我国民间一种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群众基础。对联有雅俗之分，而楹联则是可以挂出来欣赏的对联，是在特定的情境下，作者充分运用自己的学识，抒发独特情感而创作的作品。楹联是对联中的极品，优秀楹联属于艺术范畴，往往具有高雅的文化气质。楹联的创作过程跟古体诗词的创作相仿，更注重美学意义与内涵。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了解到，悬挂于中央党校校园各种亭阁或仿古建筑的楹联大概有近30副，都是由中央党校邀请国内著名的书法家亲笔书写。楹联的来源或出处有二：一部分是书法家的原创作品；大多数是从古今的经典名联中精心甄选的，或出自历代大师的手笔，或来源于集句、集字或摘句联，但果敢借鉴却不简单模仿，大胆吸收却不照搬套用。也就是说，选用的这些经典楹联，内容与形式既考虑了党校与其他院校在定位上的不同，也考虑到与其相依托的亭台楼阁的建筑风格及周边环境的协调与和谐。特别是将合适的经典楹联安置于合适的位置与载体，既彰显了继承，又突出了个性，让人感觉情景交融，浑然天成，妙趣横生。

从内容上来看，中央党校的楹联大都是对仗工整，文字凝练，含义深厚，富有哲理，积极向上，正能量弥足的上乘之作：有的直陈胸臆，抒发志存高远的人生理想；有的月明风清，表现对泰然淡泊、超乎物外的安静生活的向往；有的机敏睿智，妙语连珠，足见作者的横溢才华、独具匠心；有的纵横捭阖，驰骋古今，坦露出撰写者壮心不已、气贯长虹的豪迈与激情；还有的浅吟低唱，轻歌缓曲，流露出马蹄声碎、戎马倥偬之后的恬静、悠闲……总之，这些楹联风格各异，特色鲜明，赏心悦目，耐人寻味，催人上进，让人流连忘返。



▲匾额：红船展览馆 楹联：南湖泛舟辟地开天谋大业，掠燕求是承前启后展宏图



清，表现对泰然淡泊、超乎物外的安静生活的向往；有的机敏睿智，妙语连珠，足见作者的横溢才华、独具匠心；有的纵横捭阖，驰骋古今，坦露出撰写者壮心不已、气贯长虹的豪迈与激情；还有的浅吟低唱，轻歌缓曲，流露出马蹄声碎、戎马倥偬之后的恬静、悠闲……总之，这些楹联风格各异，特色鲜明，赏心悦目，耐人寻味，催人上进，让人流连忘返。

我为校园内这些风格各异、独具特色的楹联所吸引，并对其内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那些我不太熟悉的楹联，我有某种想一探究竟与寻根问底的冲动。比如，这些楹联的出处是哪，有什么背景、有什么含义？等等。受好奇心驱使，我开始查阅相关书籍并利用网络进行搜索。没想到这样一来，便一发而不可收，我尝试对几副原本认为很难理解的楹联进行解读和诠释，并将稿件发给《学习时报》选用。

没想到稿件发出后，很快在《学习时报》刊出，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与鞭策。直到在党校3个月的进修结束，我已在《学习时报》发出四期解读文章，共解读了九副楹联。这些解读除受到学员们欢迎外，也被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半月谈网、江苏大讲坛等网站转载。

事实上，这些楹联来源不一，出典甚多，蕴含深邃，解读不仅仅是解释、解说，还要推陈出新，守正创新，赋予其现实意义，为此，我利用课余时间或业余时间，查阅并参考了大量有关的资料、文献或书籍，或寻找，或论证，或推断，或顺藤摸瓜，力求严谨、科学、可靠。解读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提

升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让我在党校的学习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让我从中领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与无穷魅力，也让我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有了更切实、更具体、更深刻的认识与体会，不仅增长了知识，也切实增强了文化自信。

毕竟离校后，在中央党校有关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又继续进行了研究和解读。由于分布在中央党校校园内的楹联很多，品类不同来源不一，书写的字体也不同，而我不过是个楹联的爱好者，解读起来难度是可想而知。面对种种困难，党校的专家和老师们给予了很多鼓励：有的部门领导送给我整套党校沿革与发展历程的书籍，有些专家寄来了权威的资料，一些老教授亲自打电话给予指导……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些解读文章陆续在《学习时报》摘要刊出。之后，我又将这些解读的资料进行进一步整理、加工、补充、修改与完善，最终在2016年9月起名《中央党校楹联浅释》结集出版。

说实在话，《中央党校楹联浅释》出版之后，我的心里很紧张，既感到兴奋，又感到惶恐。兴奋的是，有了这本小册子，广大的读者



▲匾额：大有书局 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匾额：风景独好 楹联：朗月照人如鉴临水，时雨润物自叶流根

们，包括到中央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随手翻一翻，可以从中了解到党校浓郁的文化氛围与精神气质，感受到校园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魅力，并从中获得某种思想启迪和艺术享受。惶恐的是，自己尽管对楹联这种传统的文学艺术形式情有独钟，但并非这方面的方家，加之楹联涉及知识很广，担心解读中存在不足或纰漏。

让我感动且难忘的是，我不过是为数众多的中央党校学员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因喜欢党校的楹联并且作了一些解读，却得到了中央党校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关心与支持。当时的校领导审定与修改了其中的部分文章，并为小册子作序。党校办公厅、教务部也给予多方的帮助，使我倍感温暖。学习时报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美好记忆里，不仅有大师们在课堂里的指点迷津，让人肃然起敬；也有氤氲的校园文化，让人沉浸其间，其乐陶然。

（作者系中国矿业报社总编辑，高级记者）

庆祝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

党校情缘——学员眼中的中央党校

善于治吏的东魏廉臣崔暹

□ 张 任

贵。刚刚出任御史中尉，他就着手弹劾贪墨之臣，一大批德行有亏的高官贵戚被绳之以法。当时有一名官员叫元坦，身为东魏皇室成员，官至国家最显贵的“三公”，可是他为人凶狠粗暴，薄情寡义，即使俸禄极其丰厚，仍然行卖官鬻爵之事。崔暹走马上任后立即弹劾元坦，致其官职被黜，只留下个空头爵位。东魏尚书令司马子如曾经追随高欢南征北战，如今总揽朝廷庶务，权力很大。但此人刚愎自用，向地方官员收取大量贿

赂，崔暹揭发其贪腐之状，论罪下狱，司马子如最终被削除官爵以作惩治。还有一位叫韩轨的官员，其妹嫁与高欢，属于权臣的亲信，而他在牧守一方时，凭借非同寻常的身份肆意敛财，搜刮当地百姓，不久即被崔暹纠弹，削官夺爵。从西魏投奔东魏的斛律金也因为在并州刺史任上贪污，被崔暹弹劾落马。无论是面对元氏皇族还是权相亲信，崔暹都不给贪腐无度者留任何情面。

对于崔暹的种种举措，丞相高

欢非常认可。高欢当着百官的面，“握暹手而劳之”，称赞他“尽心为国，不避豪强”，然后赏赐骏马一匹，两人并驾议事。东魏静帝询问朝中是否有“用心公平，直言弹劾，不避亲戚”的官员，高欢唯独推荐御史中尉崔暹。于是，整个东魏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无人不敬畏崔暹的威名。

除了尽力匡正文武百官，崔暹也严于律己。高欢、高澄去世，高澄之弟高洋取代东魏，建立北齐，许多以前被德办的权贵趁机挟私报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他怀抱教育救国理想，面对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试图以教育引领思想文化觉醒，培育现代化新国民。执掌北京大学期间，他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不拘一格汇聚人才，开创学术自由之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创造了条件、拓宽了路径，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延揽革新派代表和文化名人任教北大。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校务后，革故鼎新，全力祛除积弊陋习，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风尚。为使北大真正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他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以有无专门学问为基准不拘一格广延人才，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革新派代表人物和学术大师云集北大，呈现出保守派、维新派、激进派“争奇斗艳、百家争鸣”的校园图景。正是这一时期，在蔡元培延揽下，陈独秀、李大钊、陈启修、高一涵等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和留日期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任职北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奠定了基础。

创造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校园环境。蔡元培坚持保护思想和学术自由，坚持视马克思主义为一种重要学说，面对旧思想势力和保守派压力，他鼓励学术争鸣，力排众议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宽松自由的环境。1917年，蔡元培不仅力邀陈独秀由上海来北大任教，而且支持陈独秀将《新青年》随迁至北大，《新青年》的影响力由于北大的特殊地位不断增强，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舆论阵地。在《新青年》杂志的带动下，包括《国民》《每周评论》在内的系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应运而生，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讴歌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著相继发表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等刊物上。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北京大学能够列入正式课程序列同样受惠于蔡元培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李大钊、陈启修、高一涵等教授在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系等课堂上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系列课程，相关课程安排发布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北大也成为国内最早开设马克思主义相关课程的高校。为获取一手资料，北大还专门成立了翻译小组，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出来，使北大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源头。

积极支持马克思主义社团活动。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北大传播，一批进步青年聚集在李大钊等周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潜心学习研究、热烈讨论，并于1918年组织成立了我国最早、有组织有计划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3月，李大钊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11月17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当时反动派到处防范、侦缉‘过激主义’‘过激党’的情况下”正式公开宣告成立，蔡元培不仅顶住反动派压力，同意在《北京大学日刊》刊载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公告，而且应邀在成立大会上作了简要发言。蔡元培对研究会的成立予以全心全意的支持，专门特批两间房屋作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场地。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中共北京支部的成员至少有12人，分别是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

蔡元培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 郑宏

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其中11人来自北大。

推动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先后经由日本、俄国和法国三条渠道传入中国，而法国这条传播渠道恰恰得益于蔡元培的支持。二次革命失败后，1915年6月游学法国的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玉章在巴黎组织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倡导旅法华工以工兼学，提高自身文化水平。1915年6月至1916年3月，蔡元培与法国政界、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并任中方会长，以促进“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之发展”，他亲自为赴法华工编写《华工学校讲义》40篇，帮助华工以工兼学。1919年至1920年在蔡元培等人倡导下国内掀起一股勤工俭学热潮，千余名青年选择赴法勤工俭学，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王若飞、徐特立、赵世炎、陈延年等就是通过留法勤工俭学，见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工人阶级的无情压迫，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法国也因此成为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策源地之一。

尽管蔡元培本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始终抱持教育救国理想，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保护新思想、新文化、积极延揽英才任教北大，公开支持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推动有志青年赴海外游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创造了条件，间接培养出一大批优秀革命人才，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才使得历经磨难波折的中华儿女找到了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

务头绪多，任务重，牵涉广，单靠崔暹一人力有不逮，于是他精心搜罗了一批得力助手。如毕义云、卢潜、宋钦道、李愔等人，都是史书有载的能臣，众人分工合作，各施其才。

在政局动荡的南北朝时期，崔暹为官恪尽职守、克己奉公，既让东魏北齐的吏治大为改观，也为自己赢得了“崔暹清正，天下无双”的赞誉。

